

树风学校在八松乡,我到那里的时候,学生刚刚下课,我被孩子们簇拥着走进校园。校园正中,是牛载坤半身铜像,张謇的半身铜像坐东面西。

## 听康乐的大山讲张謇故事

——“车轮上的行囊”之四十九

□黄俊生



心在路上

没有资料显示张謇曾经到过甘肃,但有充分的资料显示,南通与康乐的情缘从张謇开始。

1913年,一位叫牛载坤的甘肃青年从京师大学堂毕业,他邀约志同道合者南下,寻找教育救国之路。于是,他认识了黄炎培、张謇、史量才。在南通,他参观了南通师范、大生纱厂,第一次聆听了张謇对西部发展首先应重视教育的策论,他接受了张謇“父教育而母实业”的理念,立志回乡创办教育和实业。次年,也即是1914年,他联合其他乡绅兴办教育,康乐县有了第一所学校:八松庄“树风学校”,从而揭开了康乐县近代教育先河。出于对张謇先生的崇敬,牛载坤申请张謇题写校名、校训。张謇先生题南通师范校训“坚苦自立,忠实不欺”以赠,并在跋语上写道:“树风学校请书校训,以昔所示于南通师范者赠之,南北学风庶有大同之一日。”于是,两位先贤共同跋涉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之艰途。百年来,南通与康乐这种情缘一直在延续,且向更加深远的方向发展。

我第一次知道张謇先生与树风学校的故事,是在二十多年前。那年夏天,我来到“洮岷花儿”(花儿,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民歌)和貂蝉的故乡,作为第一个在康乐采访“希望工程”的南通媒体人,把足迹撒遍那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之后,我又数度赴康乐。当我从康乐人很难懂的方言里辨出“南通”“张謇”的字眼,从一张张被紫外线灼焦的脸上看到感激和敬仰时,十分讶异:是什么让距南通2000多公里的大山这么熟悉张謇,这么感激南通?于是,那些朴实的山民向我讲起树风学校,讲起牛载坤,讲起南通情系康乐失学儿童的故事……

康乐县有两尊张謇铜像,一尊在县博物馆,一尊在八松乡树风小学。一尊是全身像,一尊为半身像。到达康乐的当天,刚下车,县委宣传部冯海红副部长、县教育局马致忠书记就说:“走,先去看看张謇先生铜像”。

在新建成的县博物馆,我阅读着康乐的悠久历史。4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康乐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里是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哇文化的发祥地,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里兼有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地貌特征,粗犷中蕴含娇媚,有首诗“白石横空碧削削,云霞飞渡炊烟高。青山逶迤舞苍龙,峰石蜿蜒走银蛟”,就是描写的这里。

暮地,我在一扇橱窗前站住了,一尊熟悉的全身立像进入我的眼帘。这尊铜像,张謇身着长袍短褂,双手微挽袍角,两眼仰视,目光深邃,脚下是山路,右脚向前迈进,表现出张謇一生都在崎岖中摸索前行的顽强与不屈精神。

那时正是夜与昼交汇的时刻,寂静在四周弥漫,从我家院子里能听到对岸亚新家的方向传来的“白头翁”的咆哮声,我知道亚新正在挨他爸臭骂。

## 谛听

□刘剑波



小镇忆旧

去长小上学,我通常走前街。小镇有三条东西向的街,即前街,正街和后街,状如“川”字。但只有中间的正街是严格意义上的街道,这不仅因为正街既宽又直,而且小镇的所有店铺和商业活动,都集中在正街上。前街简直算不上街,它像蛇一样扭曲,房屋错落,毫无章法,形成了太多拐角,道路就在拐角处蜿蜒。前街也有个店铺,唯一的一家店铺,即徐家药店,主要售卖中药。徐家孩子众多,清一色的男丁,好打架。我姥姥老是告诫我,“千万不要跟徐家药店的孩子玩”。所以,从徐家药店门口经过时,我总是疾步通过。徐家药店的东隔壁就是“麻木队长”家。“麻木队长”叫陈秀峰,但小镇人都叫他“麻木队长”,可能他做事太麻木了吧。这个浑号是谁给他起的,现在已无从考证。我印象中,“麻木队长”总是坐在街道的某个角落跟郭新民对弈。“麻木队长”戴着近视眼镜——那个年代,小镇很少有人戴眼镜——“麻木队长”不仅戴眼镜,而且近视程度深得可怕,这总是让我产生错觉,觉得他不是戴的眼镜,而是戴的茶杯。他俯身在棋盘上,眼镜几乎贴在棋子上。郭新民书读多了,人们叫他郭呆子。当然不敢当面叫,郭新民也有暴躁的时候,有一次深更半夜,他把一位桑姓书记家的玻璃门砸了,小镇人暗暗叫好——那是违章建筑,可见郭新民是主持公道讲正义的。“麻木队长”唯一的爱好就是下棋,也下得不错,但总是玩不过郭新民,又不屈服,两个人的棋局从早摆到晚,成了小镇的一道风景。

“麻木队长”家的东隔壁是做鞋子的春支家。春支白净,五官端正,称得上美男,可惜腿瘸,且瘸得厉害,每日靠挪动一张高凳行走。当他挪动高凳时,那条瘸腿便在地上拖动,高凳成



立像旁边一只黄缎带盒上写着“中国文化名人系列雕塑”。冯海红说,这是张謇老先生的嫡孙女张柔武女士捐赠给我们县上的,我们把他陈列在博物馆,凡有客人来,我们都会带到这里,讲一讲张謇和牛载坤的故事。

树风学校在八松乡,我到那里的时候,学生刚刚下课,我被孩子们簇拥着走进校园。校园正中,是牛载坤半身铜像,张謇的半身铜像坐东面西。教学楼上方“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八个铜字在高原的骄阳下熠熠闪光。这里的孩子都知道张謇,几个孩子围着我,像背诵课文一样齐声说:“张謇是江苏南通人,清朝末代状元,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一生创办二十几个工厂,370多所学校……”其状令人忍俊不禁,又不由地心生感动。

在校史室,校长康志平拿出一沓沓相关资料,其中有张謇嫡孙张绪武先生亲笔书写“康乐县树风中学”“康乐县树风小学”“饮水思源,永续情缘”的墨宝。树风学校是康乐县第一所乡村学校,也是牛载坤走“教育救国”之路的肇始。在1914年之后的数年里,牛载坤邀约其他乡绅,又兴办了13所小学,使康乐的教育走到了甘肃省的前列。

牛载坤出生于1886年,比张謇小33岁,所以,牛载坤见张謇时,谦恭地执弟子之礼,然而,张謇赞赏牛载坤胸有宏图,却以朋友身份相待。牛载坤曾是个激进的革命学生,私下买下手枪,偷偷练习枪法,想以牺牲热血来响应孙文的三民主义,推翻满清,恢复中华。这个姓牛的男子,有着牛样的脾气,1934年春,他在担任民勤县长任上,义正词严地拒绝给军队大量派车派伙,得罪了军阀马步青。是年6月,他晋省述职,半途被埋伏的歹徒枪杀,时年48岁。民勤人民在县城树立“甘棠遗爱”牌坊,以志纪念。

……

当我离开康乐之时,康乐与南通劳务输出深度合作暨康乐南通劳务管理站揭牌仪式在南通举行。

在康乐,我获得两组数据,一组是康乐有1300名失学儿童得到南通人资助复学,一组

是现在在5000多位康乐青年在南通就业。透露这两组数据的马致忠十分感慨:从张謇开始的两地交往,是血浓于水的情缘;南通好心人自发资助康乐失学儿童,是这种情缘的延续与发展。

曾经担任过康乐县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的曹海忠,口袋里常常揣着一本小本本,上面记载着南通资助失学儿童的名单以及康乐与南通交往的大事记:

1995年5月,收到南通电子仪器厂工程师袁雨洲要求资助学生的第一封来信,由他发起了南通好心人向康乐县贫困儿童的结对助学活动;

1996年7月,《江海晚报》社会新闻部副主任黄俊生和青年企业家许彬第一次来康乐考察、采访;

1997年9月,南通市钟秀乡在八松初中设立“钟秀希望班”,出资40500元,资助45名学生读完初中;

1999年9月,南通市虹桥二中将初一(7)班命名为“康乐班”,3年后“康乐班”被命名为“全国优秀班集体”;

2002年3月,南通市国税一分局在县二中资助40名初中生,受助资金10多万元;

2005年7月,《江海晚报》社组织“康乐学子南通探亲之旅”,13名“康乐儿女”与“南通父母”团聚;

2006年2月13日,首批13名农民工赴南通春兰电器厂务工,拉开了康乐县向南通输转劳务的序幕;

2007年3月21日,徐守盛省长就康乐县和南通开展结对救助和劳务合作批示,称赞此举是件“很有意义的和谐之举”。

……

当我离开康乐之时,康乐与南通劳务输出深度合作暨康乐南通劳务管理站揭牌仪式在南通举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紫琅茶座

直至今日,各种改良的旗袍还在生活中出现,与旗袍有关的文化还在延续。

## 旗袍欲望史

□强雯



博物奇妙

当大量的旗袍走进博物馆,会让人恍惚,是否误入了成衣橱窗?欲望在晦明晦暗的空间里游荡,时光在倒退还是舞台即将拉开序幕?

女人身上的两片布,承载着爱情与阴谋,主权捍卫与侵略蚕食。这不仅是一个时尚的流变,也是文化运动的角斗场。清末、民国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两片耗尽心血的绸缎里,风起云涌。

旗袍本是清代人的日常服饰,然而辛亥革命之后,海派旗袍应运而生,并以其新异之貌,打出徽号,这就表明要和北京,这个皇城之地的文化,平起平坐。而海派旗袍的发源地上海,更是成了妇女运动解放的重镇。

上海历史博物馆以文物之名,收藏了五六十年清代直至民国时期的海派旗袍,似乎要给这个时代的风流云变,制作一份华美的标本。

汉族女子自古以来就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到了晚清仍是上袄下裙的穿法居多。短衫长裙,一般要系上绸带。裙子普遍设计宽大,样式多有百褶裙、凤尾裙、月华裙等。清代女性旗人所穿之袍,衣身宽大,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袍长至脚踝。晚清时期,作为全国时尚风向标的上海,虽然女装争奇斗艳一年数变,但是基本的形式仍旧为上衣下裙或上袄下裤。中式的袍褂、衫袄、马甲、裙、裤等还是上海传统风格女装的主要品种。

博物馆里最典型的是一件黑地盘金绣镶花边对襟褂。这件袍底色为黑色,衣服表面刺绣有金线、银线交错的花纹、花纹,金葫芦、金叶、金团盘中有金线和红线交替绣成的牡丹花。肩部、前襟、底部,则以白色为底,绣有人物花卉、假山楼阁等,有工笔人物画的风范和情节感。通体来看,衣服有一种低调的奢华,体现了富贵福祿之求,这种意蕴弥补了总体造型平直而宽松的不足。

晚清时期富贵人家里的袍服,对细节是“不怕繁”,尤其舍得在边襟上做细功夫。

紫地绣镶花边大襟袍便是一个典型。开衩在衣领、袖口、门襟、下摆开叉等处装饰都费尽心思。红、紫、蓝、白等花卉、蝴蝶交错而行,袍身整体呈上窄下阔之形状,上身和袖子部位裁剪合体。

富贵不足看。那么平民的日常便装是何种呢?印花白杜布女袄,白色为底,藏蓝色的蝴蝶和葫芦满布。看上去素净、清爽。便于洗衣打扫等劳动。其实这种服饰风格在今天仍旧有延续,不过多采用棉布或棉麻布,上了藏蓝色花纹。又名休闲风或民族风。

这一时期的海派旗袍还趋向于保守,多有京派旗袍的风格。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海派旗袍有了明显的变化,在腰身和袖子上做了改进,流行起了倒大袖,也就是上窄下宽,比如一件湖蓝绸面印花圆摆女夹袄,就很典型,领口、门襟、下摆处均有黑缎滚边。

倒大袖短袄,十分受年轻女性欢迎,一度被称为“文明新装”。同样是上衣下裙的搭配,此案样式在当时也可谓是极其大胆的时装了。

软缎豆青短袄,继续低调奢华的风范。豆青色的面料上,有夸张而繁复的暗纹,是中国最典型的那种富贵之气。不过从这件短袄上可以看出袖子的改变。“改良版的倒大袖”,裁剪出了更合体的窄袖,保留了收腰和圆下摆的特色,这样风格就不会恣肆地从袖子里灌进去,可谓又是御寒又美观。

一款米色植绒镶花边长袖旗袍,是20世纪20-30年代的热门款式。旗袍衣长至小腿,衣袖还留有一些倒大袖的痕迹,衣缘镶嵌有较宽的花边。全身的植绒成圆圈状,中间有褐色小点为中心点缀,是一种抽象了的板栗或荔枝,有含蓄美感。

植绒面料在那个时代应该是一种主流,因为它对光线的折射不同,手感细腻,不少旗袍会选择在植绒面料上下功夫。比如一款植绒花卉短袖旗袍,朱红色的牡丹与浅褐色的玫瑰,一朵接一朵盛开在米色植绒旗袍上,透露出欲望和生命力。滚本色缎边,斜襟,简约又不失华贵。

黄地绣花缎面衬绒旗袍,长及脚踝,裁剪出了合体的窄袖,腰身略收,浅黄色断面上绣着橘色花卉图案装饰,繁净文雅,又不失雍容。

当时的一般旗袍开襟都用暗扣,外表用花扣装饰,所采用的团多为龙、凤、孔雀、福、寿、喜等吉祥图案,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传统文化。

20世纪30年代,旗袍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中国妇女最时髦的服装。旗袍受到西方哥特、巴洛克、洛可可等美学以及立体服饰的影响,也开始向立体服饰造型转化。而海派旗袍,外国衣料大量涌入,对服饰的变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领子的设计,先是崇尚高领,后来又流行低领甚至无领。袖子时而长过手,时而又短至肘部。两边开衩很高,腰身变得极窄,更凸显了女性的曼妙身材。虽然纯西方的礼服和长裙已经在上海女界身上开花,但海派旗袍的中西融合也丝毫没有逊色。

据史料记载,彼时上海时装的核心是美术,往往由设计师在报刊上刊登设计款式,待读者看中制为成衣。画家参与进来,旗袍就当进了山水画的意味,比如适当“露体”,可能就是留白的一种表达。无袖旗袍出现了。

无袖旗袍对女人身材的要求则更高,比如不能手臂太肥太瘦,腋下之物需处理干净,红面绣花无袖旗袍就是这样。偏西化的无袖、收腰、收臀,来显现女性的人体美。中国红的真丝面料上,在胸部、腰身以下镶嵌有红花黑叶的繁枝。黑底白色花叶刺绣滚边,热情又不失精致。

旗袍上的领子可不可以随意拆换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是突破传统的一种方式,在正式场合要把旗袍的高领高高竖起,在闲暇时候,姑且取了吧,一边凉快去。

其实假领的设计最早始于1820年美国的设计,当时是用于男性衬衫领的可拆卸,箭牌领也因此得以确立。后来的四十年里,假领子风靡美国,专门生产假领子的工厂也应运而生。西风东渐,海派旗袍也吸收了这种服饰观念。

衣如其人。如此折腾的旗袍,大概和上海女人一样,在不断尝试和自我革新自己的命运。

1935年,由蔡楚生执导的电影《新女性》上映,阮玲玉饰演的知识女性韦明遭遇婚姻失败后,期望依靠自身力量和女儿生活下去,在事业和情感中,她妥协不随流而下。一身旗袍的韦明,浑身却是显示挣扎与改变命运的一股力量,虽然电影是个悲剧,但在过程中的“折腾”,何尝不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越演越烈的新文化运动本身?

旗袍是具体,亦是象征。

为了减少成本,设计者省去了刺绣的繁复,开始采用直接印花在旗袍上,花色更多了起来。还有直接以“海上花”命名的旗袍。上海的城市之花是玉兰,张扬、洁白、硕大,将玉兰镶嵌在旗袍中,明暗交替,有今朝一切美好落于闺阁中的意境。仿佛女人也随着旗袍上的玉兰一同芬芳起来。

直至今日,各种改良的旗袍还在生活中出现,与旗袍有关的文化还在延续,比如那个时代的文学、思潮、十里洋场里的中西方文化交流。而一代代手工艺精良的裁缝手工艺者,也让两片云裳,充满了故事。